

2014

多源多流：

双甲子台湾文学（史）

黄万华 著

多源多流：

双甲子台湾文学（史）

黄万华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 / 黄万华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7-5360-7336-4

I. ①多… II. ①黄… III. ①台湾文学—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1076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李加联 杜小焯  
技术编辑：薛伟民 陈诗泳  
装帧设计：林露茜

---

书 名 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  
DUO YUAN DUO LIU SHUANG JIA ZI TAI WAN WEN XUE SH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2 1 插页  
字 数 42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 前言

### 面对台湾文学，我们该有什么样的现当代文学史观

1895—2014年，台湾文学走过了双甲子年。台湾文学是“在台湾这个地理空间所产生的文学，不论其族群、国籍及使用语言”<sup>①</sup>，这一宽泛的台湾文学定义，反映出台湾文学包含的源流、层面的多样复杂。但毫无疑问，台湾文学的主体是生活（曾生活）于台湾的作家，从原住民出身，到不同时代移民（住民）出身，他们的经历，都与台湾社会（土地）的命运息息相关。这120年中，台湾文学同祖国大陆、香港文学一样，经历了从古典性向现代性的根本性转换，而这种转换发生在从被殖民到民主化的复杂历史进程中，它既源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又形成了自身的文学传统；既与祖国大陆、香港、海外华人文学一起共同展开了中华民族新文学的历史进程，又与它们（尤其是祖国大陆文学）有着汲取、“反哺”、接纳、互动等多种联系；既有自身主体性建构的丰富实践，又有身处中华、面向世界的骄人成就。它与中华民族其他地域的文学，有其历史整体性，也有丰富差异性。正是因为这些，当我们面对台湾文学时，我们的文学史观会得以调整、深化。这里，只以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观的论述，表达我们面对台湾文学时的一种学术视野。

#### 一

台湾文学的历史再次提醒我们，清末民初后产生的现当代文学不同于一统性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它的分合性，这种分合性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是同时发生于祖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社群某些

<sup>①</sup> 李瑞腾《台湾文学史长编·总序》，台南台湾文学馆2013年版，第1页。

历史空间的进程，并逐步衍生成“中国与海外”格局中的汉语现当代文学。在这样一种文学格局中，考察其中任何一种文学，都需要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视野。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视野是指不要“迷思”于文学的某一端（例如对于文学史的分期，关注其起源、“进化”，依据流派、世代的演变，强调文学本质性的思考等，都有其必要性，但不可陷入其“迷思”，否则就会在预设价值、意图伦理的迷失中遮蔽了文学史），而要有复杂纠结，乃至对峙的因素间的互为参照（例如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国族的统一性和文学的本土化、“横的移植”的世界性和“纵的继承”的民族性、作家良知和文学品格等都需要互为参照，才能接纳下整个现当代文学自身），其中，本土与境外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视野显得更加重要，即祖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治文学史者各有其本土，本土之外的就构成了其境外，不管置身何处“本土”，都不可受制于“本土中心”或“本土边缘”心态（“边缘”心态也会产生强烈的建构“本土中心”的冲动）；关注本土，恰恰要在本土与境外的互为参照中完成，在跨越本土的观照中反观本土，这样才可能走出文学史“迷思”。以本土和境外文学的互为参照，建立一种跨越本土的、流动性的文学史观，以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突破对现当代文学的人为分割。

祖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现当代文学虽然在某个时期表现为影响和被影响关系，但更多时候是相依共生、多元当道。这种多元共生有多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现当代文学从诞生开始就是多源多流的，并逐步形成了多种传统，从文学的本质就在于多元而言，现当代文学的源流数脉并存，当道并行，并无“中心”和“边缘”、“主流”和“支流”之分。尽管后来话语权力分化，某一时期“中心”确立，余者黯然失色，甚至悄然退场，但在新文学的源头脉上，却是有容乃大，这才使得日后隐现交替中有泉可涌。这就出现了近百余年文学历史中的一种情况：传统的转移，就是说由于某一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等环境的激烈变动，原先生存于这一地区的一些文学传统难以容身，但并未灭绝，而是流散到了别的地区，甚至在别的地区仍保持强盛的发展势头。以往我们只着眼于某一地区来考察文学，往往会得出某些文学传统断裂的结论。但实际上，“东方不亮西方亮”，某种文学传统在此时此地沉寂，却在此时彼地兴盛，这才是近百余年文学的历史格局。例如，1945年抗战胜利后，左翼文学传统在祖国大陆凭借中共战事的节节胜利而日益壮大，逐步主导整个祖国大陆文坛，其他文学传统，如关注文学本身的自由主义文学传统、以都市文化作为主要资源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具有文化消费倾向的通俗文学传统在大陆地区日益萎缩，但并未消亡，而是流落到了台湾、香港。而正是这些文学传统的离散，才使得战后至1960年代的台湾文学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中仍以多种文学思

潮的相激互生取得了重要的创作实绩<sup>①</sup>，而同时期的香港文学也在多种文学传统的滋养中取得了“主体性”建设的重大进展<sup>②</sup>。这种文学传统转移、流散的情况，从根本上改变了祖国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单一格局，会引起我们对原先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生成”的重新追问。

另一种情况是同一种文学传统同时生存于跟地域联系在一起，又由政治体制、语言文化环境等互相隔离的社会空间中，呈现出不同的现实形态。只有在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中，这种文学传统的生成、运行机制才可能得以揭示。例如，战后的左翼文学在祖国大陆进入体制，演变为党的文学。如果只考察这种情况，难以弄清在战后东西方意识形态高度对峙的世界环境中，左翼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深层次的生成机制到底怎样。而这时期台湾、香港的左翼文学提供了另外两种形态。战后台湾左翼文学思潮汇合了台湾日据时期左翼文学传统和大陆赴台左翼文学力量，一度强盛，但随后在政府当局的政治高压下受挫，沉潜至乡土民间。而在香港，战后左翼文学成功构筑了一个在体制外主导作者、读者及其公共空间的影响、传播机制，进行了一系列可以称为日后祖国大陆文艺模式的先声的文学活动<sup>③</sup>。而它并未介入体制上的意识形态操作，虽然强大，也未成为宰制性力量，它和香港的右翼文学等处于“自由竞争”中的对峙状态，既有“冷战”时期意识形态背景上的尖锐冲突，又在文化、文学层面上有较大回旋空间，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承、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上都有积极作用的发挥。中国三地文学，提供了左翼文学生存、发展的三种形态，将它们互为参照地予以考察，非常有利于弄清在战后冷战意识形态的背景上，左翼文学传统的变化及其文学史的意义<sup>④</sup>。

再一种情况是在近百年的历史对峙和汇流、文化相隔和交流中有着种种曲折，从而使得不同地区的文学形成了不同的传统。20世纪的历史现实性使祖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华人社会在价值观念、语言意象、生活方式、家庭体式、精神世界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时，其文学的题旨形象体式、情味色调质感，都已显示出各自的独立性，也就是说，现当代汉语文学的多元传统已具有了地区的独立性。事实上，在民族文学的内部，如果某一种文学实际上处于“边缘”（例如海外华文文学），那它就可能去形成自己的传统，构建相对的中心化态势。这种地区歧异性形成的传统独立性，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中更加凸现，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一统

① 黄万华《战后至1960年代台湾文学辨析》，《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② 黄万华《在右翼政治对峙中的战后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学术月刊》2007年。

③ 黄万华《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④ 黄万华《左翼文学思潮和世界华文文学》，《文史哲》2007年第2期；黄万华《战后左翼文学的三种形态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史哲》2013年第3期。

性的力量被抽离，许多影响会进入到国家层面以下，直接对地方（“本土”）发生作用，自然有利于地区性传统的形成。而地区性传统的形成，不是削弱，而是丰富了民族文化传统。

上述情况都说明，近百余年世界文学中，似乎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学，像中华民族文学一样，被百年历史风云所裹挟的巨大冲击力打碎、切割，抛撒到社会体制、人文环境、语言格局、外来影响迥然有异的多种空间生存繁衍，形成了分隔已久，看似各行其是的各种传统。以往，我们往往或局限于某一时空的特定文学形势来虚泛地谈“中心”和“边缘”，或以拼合式的架构罗列不同板块、地区现当代文学的异同。这样，就难以真正进入历史整合的学术思考。倡导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视野，就是希望治文学史者人在本土，却能观照境外；在学术“旅行”中既能反观“原乡”所在，又能对“他乡”在地文化有深切关怀。而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文学的研究，就是要从不同的本土出发，聚合起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照，充分接纳其历史和现状的丰富性。

我们目前的现当代文学史仍有所残缺（不仅有境外的“缺席”，而且有“本土”的缺失），其原因往往跟我们对现当代文学的一些重要命题，如“思想启蒙”“民族认同”“现代性”“民族性”“乡土性”“主体性”“多元性”“文学传统”“文学精神”等的单一认识有关。这些重要命题产生于19世纪末至今中国社会被隔离的不同政治、文化空间中，一个命题也就有了不同的内容模式，而恰恰是不同模式及其关系才足以揭示这一命题的内涵意义。例如文学的“民族认同”，只有在祖国大陆、台湾、港澳文学等互为参照的视野中才足以揭示其多个层面的复杂性。本来，“民族国家与其说是工业化的产物，不如说是现代性的产物”<sup>①</sup>。但在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国族认同成为文学的民族认同的最重要层面。而中国的国族认同又发生于资本主义、三民主义、殖民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社会时空中，长期缺乏稳定的、为全民族基本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高昂的爱国热情或为不同的政治领袖所驾驭，或出现严重的分化。单一地就某一社会时空来考察民族认同对文学的影响，恐怕看不清其中的复杂情况，甚至产生偏颇的认识。而互为参照的视野就不同了，起码可以看到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民族认同的复杂纠结和国族认同、伦理价值认同、文化审美认同等多个层面，从而有助于我们去探寻民族认同的本质是什么，它与思想启蒙可能发生的契合点在哪儿，由此反省民族整体内在性上的缺失，弄清民族认同和现当代文学文学之间的历

<sup>①</sup> [英] 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何莉君译，《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史关系。例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祖国大陆和台湾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处于高昂状态，大陆情况已为我们熟知，而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则更多选择与中国传统、正统相关的内容，以扮演民族领袖的角色。两岸都强调对外发出统一的声音，这种统一性必然要求在政体、民族内部消泯异质性。当两岸文学由此都展开宏大的国族叙事时，相异的政治规范对文学的控制都得到了实现。此时期两岸的政治意识形态迥异，而正是这种“殊途同归”在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上揭示了中国民族认同的缺失。民族认同实际上是现代民族文化整合的过程，一旦民族国家建立，“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sup>①</sup>，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以公民权（其核心是平等、自由）的实现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性、民族意识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公民资源。然而，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能充分形成兼具民族性和公民性的民族意识。如果考察此时期祖国大陆的“红色经典”和台湾地区的“战斗文艺”，并且与这一时期两岸文学对政治规范不同程度的突破进行对比，那么我们会认识到，民族认同还是应该从五四启蒙强调的“人的解放”的内在点出发，即对“人”的尊重是对人“生存的具体形式”及其价值的尊重，而人“生存的具体形式”既包括民族个性的生存方式，也包括个体生命的生存方式，后者指每个人都能“平等”“自由”地获得应有的生存方式，自然摒弃那种以剥夺一部分人（哪怕是少数）的生存权利来“改善”另一部分人（哪怕是多数）的生存状况的做法。而作家个性的生存方式的存在与否决定了文学有否可能突破民族认同的负面制约，战后至1970年代台湾文学在政治高压下仍能在女性文学、现代主义文学、通俗文学、“乡土”文学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就包含了这方面的丰富经验。

显然，当我们在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视野中把握民族认同的复杂状况，从而深入思考思想启蒙和民族认同的关系时，我们就不至于各执一端而放逐种种文学历史了。

以往现当代文学史的残缺还在于史的“文学性”也严重不足。一是“诗的存在是为了印证思潮（理论）的存在”成为文学史的习见。文学史一般的撰述往往讲述“思潮、运动、格局、基本线索”一类“统摄性”内容，这自然有助于历史叙述的条理性，但行而久之，慢慢成为一种“‘历史’的重要性超越‘文学’本身的重要性”的固定思维，而有时梳理的思潮、理论的脉络疏离于个性丰富的创作实践，甚至遮蔽了文学本身具有的人生观照的复杂性和审美传达的丰富性。二是通过形式/语言的把握为文学史去蔽的努力欠缺。文学的历史主要通过形式/语言的表现才得以呈

<sup>①</sup> [英] 埃克里·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现，其内容更多地隐藏于形式/语言中。文学历史不同于其他历史叙述的，也在于那些非通过形式/语言的把握就不足以揭示的内容中。无论就形式/语言意识而言，还是就形式/语言分析能力而言，我们对文学的叙述往往显得缺失，这种缺失造成了对文学历史的遮蔽。而由于台湾与祖国大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均有根本性不同，当我们面对台湾文学，力图了解、把握它时，文学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的超越就得以呈现，这种超越只能指向作家个性的创作实践和“文学语言”自身。

“七十八十初知天命”，五四至今也90余年了，祖国大陆文学也好，台湾文学也好，虽屡经曲折，也已知“天命”，而其含义大致都有两层：一是如何不被政治、经济等属性淹没，而保持文学作为人类通过情感性想象去感悟生命之美的生存方式的独立品格；二是指不要被别种强势文化淹没，而保持自己族裔的、乡土的文学特性，这中间既包含作家个体角色的定位，也有着不同地区文学适得其所的角色定位。

作家心灵视野的广阔、文学情理世界的宽容，都在告诉我们文学是什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学作为以情感性想象展示生命之美的艺术思维，不同于以逻辑推理揭示事物之真的科学思维，不同于以价值尺度追求人类之善的伦理思维，也不同于以偶像崇拜求得灵魂之安的宗教思维，文学正是从其自身的这一本质存在出发呈现出其生命整体感。治文学史者难免有自己的倾向、情感、偏好，但如果因此而排斥了任何一种文学，那么恰恰是对自己文学生命的致命伤害；治文学史者也往往从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出发，但延续生命的就不只是这片土地。祖国大陆的治文学史者，面对台湾文学，会更深切感受到这一点。

## 二

祖国大陆高校开设的现当代文学是以内地作为本土的文学史，它应该自然地“接纳”台湾、香港、澳门文学和某些层面的海外华文文学（例如留学生文学、第一代侨民文学等）。但这种接纳遇到的障碍首先是文学史分期的问题。而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观有利于这一问题的处理。

目前祖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仍依照五四运动（1919）、北伐战争失败（1927）、抗日战争爆发（193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等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确定其文学史分期，近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止、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的讨论已拓展出相当大的学术空间。从本土（祖国大陆）和境外（台湾、香港等）互为参照的文学视野出发，文学转型、分合态势对于文学史分期的影响就有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决定文学史分期的自然是

文学的历史特性，然而，正如马克·波斯特在谈及两个时代的划分时所言，“社会理论的作用就是联系主导性的各种形式以及自由的潜在可能，对历史事物，对变化着的事物的确定”，因此，“分期只是一个分析上的而不是总体论上的姿态”，引入一种新的分期，只是“要引起人们”“关注某些革新”，并非要清晰“划定分界线”，因为任何历史分期都不可能把前后两个阶段划分得清清楚楚，相反，“早期状况自然还在延续”，甚至“还占据优势”，只是新的因素已无法去却，而且，“一个历史阶段的强行推出意味着的，可能不是从一种存在状态过渡到了另一状态，而是意味着一种复杂化，意味着将一种结构与另一种结构加以叠合，意味着对同一社会空间中的不同原则进行增值处理或多重处理。阶段或时期并非彼此相继而是相互涵盖，并非彼此置换而是相互补充，并非按顺序发生而是同时存在”<sup>①</sup>。还可以对照詹姆逊所言：“每一个社会构成或历史上现存的社会事实上都包含了几种生产方式的同时交叠和共存，包括现在在结构上已被贬到新的生产方式之内的从属位置的旧的生产方式的痕迹和残存，以及与现在制度不相一致但又未生成自己的自治空间的预示倾向。”<sup>②</sup>五四后祖国大陆各种社会变革思潮的起伏消长中，激进的，乃至“一刀两断”式的左翼思潮逐渐成为主导力量，直至“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果只着眼于祖国大陆某些特定时期的状况，我们确实难以意识到“交叠和共存”以及“自由的潜在可能”。而当我们进入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的视野，那种“交叠和共存”的社会构成改变了以往线性演进的社会模式，各种社会思潮（包括文学思潮）以种种进退纠结、“先”“后”交叠形态存在的情况就会较清晰地呈现出来。面对差异丰富的现当代文学，其分期就更不可清晰“划定分界线”，而要既找到各个时期“主导性的种种形式”，关注文学转型中新的“自治空间”的生成，又敏锐发现“自由的潜在可能”，在两者的“协合”中呈现“新”“旧”之间“叠合”“附生”“共存”“多重增值”“相互涵盖”“相互补充”等丰富状态。这样，我们才不会把本土视野中的文学曲折/倒退误认为民族新文学的转型，才可能把握住那些“确已产生了足以构成两个历史时期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是反映了历史的前进”而不是“倒退”，“是不可逆转的而不是转瞬即逝”<sup>③</sup>的文学转型，从而真正明了现当代文学该追求什么，在追求什么。

思想启蒙和民族认同纠结中的文学转换，政治意识形态下文学“主体性”的追求，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形成进程中文学的多元发展，这三种形态构成了现当

① [美]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② 胡亚敏《后现代社会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③ 章培恒《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章培恒、陈思和主编《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代文学始终前进的状态，它们是祖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华人社会都面临过的最重要的文学课题，其实践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时期。

五四前至抗日战争，思想启蒙强调的人类普适性价值和以国族认同为中心的民族认同产生了复杂的纠结。本来，思想启蒙和民族认同并不构成根本性的对立，正是思想启蒙运动“不承认任何权威，并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的“普遍倾向”<sup>①</sup>在传统王朝观念被批判之后，催生了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但内忧外患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始终内在牵制着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现代民族国家资源中的公民性遭到巨大压抑，以国族认同为核心的民族认同偏离思想启蒙的普适性价值并时而发生冲突，民族认同甚至会形成反启蒙的倾向。以往人们所说的祖国大陆启蒙和救亡的矛盾就是这样发生的。而在日据、英殖空间中诞生的台湾、香港新文学，民族认同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在形成兼具民族性和公民性的民族意识上也显得十分艰难，其民族文化认同也是在国族认同成为禁忌的政治情境中才将民族认同转移至文化认同，这样的文化认同，其旨归仍在于国族认同。

值得关注的是，以往认为抗战是“救亡压倒启蒙”的时期，抗战还有更值得关注的另一面，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人类性的专制、奴役与民主、自由的对峙，作为中国唯一全面参与的世界性战争，它使中华民族直接置身于跟整个人类息息相通的环境中，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和对世界文明危机的洞察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民族新文学进入人类悲悯和人性拯救的层面。正是这种世界战争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思潮承担起了救亡中的启蒙作用，显示出战时八年文学与战前文学的根本差异。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世界性视野中，我们才能意识到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挣脱、排除、批判一切人为的、意识形态上的，妨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枷锁和束缚的思想运动”<sup>②</sup>，已意味着一切旨在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对既定制度或流行观念做批判性思考的都被纳入启蒙的范畴，抗战和启蒙并未构成根本性对立。对于台湾文学而言，1937—1945年的战争时期，也是一个更为深入的民族认同时期，中文全面被禁，皇民化运动“脱胎换骨”的民族改造，使民族认同深入到人性、人之存在的内在层面，从而深化文学启蒙的根本性话题。

战后至1970年代的整个东亚地区，都被置于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下，自由主义同共产主义在体制内外的分化、对峙，成为影响亚洲知识分子抉择的最重大因素，形成不同地区左、右翼政治高压的环境。战后开启了现代文学传统在两岸，乃至海

①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② 张芝联《关于启蒙运动若干问题的再认识》，载张芝联《二十年来演讲录》，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页。

外的转移、流落，与当地本土化文学进程结合在一起，展开了突破体制内外的政治高压的文学主体性建设。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文学格局，形成于这一时期；超越台湾“孤岛”的隔绝，突破威权政治的高压，努力定位于中华历史脉络中，汇合本土传统和迁台资源的台湾文学精神，开始形成于这一时期；脱出落叶归根的华侨文学的轨道，开始落地生根的华文/华人文学，也开始于这一时期。即使就开启“中国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文学”而言，其生成是在抗战后期开始的解放区文学和战后4年的香港文学中，“十七年文学”面临的困境也存在于1949年后台湾文学中，“十七年文学”脉络的理清需要引入战后台湾、香港文学的参照，更需要置于战后民族新文学的整体格局中。从延安时代到共和国时代祖国大陆文学的基本格局是要寻求能否在历史的磨合中形成作家创作与党的文艺政策的良性互动，能否在政策文化的集体要求中保留艺术个性的丰富形态。尽管这种寻求在高度一体化的政治规范的宰制下甚至演变为“文革”灾难，但它也可视为大陆文学在社会主义“规范”内的自觉自立的实践，其中必然包含着文学主体性的课题。

1975年蒋介石去世，台湾的威权政治开始削弱，到1986年台湾“党禁”开放，言论开始自由，台湾文学经历了从流派对峙，更迭到世代多元存在的变化。1976年祖国大陆“文革”结束，1978年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到1980年代末大致确定了以经济改革带动社会变革的方向，文学也开始从单一的政治主导形态中走出来，并开始从文学的多样化向文学的多元性过渡。1982年，香港回归的中英谈判启动，香港社会由此受到巨大震动，然而无论是“1982”，还是“1997”，都未构成香港文学的根本分水岭，香港文学在内在的整体层面上还是延续了自身在对现代工商社会的价值尺度、生活节奏、消费方式应变的实践中坚持从容的审美创作、拓展多元的个性品格的脉络，逐步形成既摆脱“英联邦空间”的文化认同，又相异于中国内地意识形态的香港意识（“1982”“1997”也都加深了这种香港意识），不断丰富其融合都市乡土味和现代性的艺术空间。将上述情况互为参照，我们大致可以把握到，1970年代后中国文学“转型”的核心内容是如何在促成稳定的多元价值的社会结构的历史进程中真正实现文学的多元化。所谓稳定的多元价值的社会结构是指不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有各自独立的价值运作，而且各个领域内部也发展出较稳定扎实的多元价值，这样社会结构才可能在互相制衡中有真正的稳定，文学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在自身层面上回应时代性，才能真正形成文学的多元形态。

1980年代后的香港文学能将“九七”这样重大的社会时代性命题纳入其自身的发展轨迹，而不是相反，反映出香港社会百年发展已开始形成较为稳定的多元价值的社会结构，尽管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等尚未“同步”，但各自独立

的状况已形成，而香港文学也避免了将社会的时代性命题显在等同于文学的时代性价值的状况。稳定的多元价值的社会结构与多元的文学生态开始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相比较之下，台湾“党禁”和言论自由开放近30年，整个社会的运作形成稳定的多元价值有其曲折。整个社会的民主制度建设得以基本完成，但政党轮替中，政治威权对教育领域价值的宰制还有影响，“统独”的政治问题引发的文化认同也潜在而有力地影响台湾文学，表明政治“单一威权的特质”尚须更彻底清除。但同时，台湾文化的“草根性”（自下而上地生发）有力消解政治威权，台湾文学也以其多个方向的探寻以及“派”的消解、“代”的凸显推进着社会多元价值结构的生成。所以，1970年代后的台湾文学是在不断挣脱政治威权的影响中，逐步蕴蓄起文学的多元化形态。同时期的祖国大陆文学在整个社会远未形成稳定的多元价值结构的情况下，借助于国内主要由经济变革带来的社会生活多样化和国际的全球化语境、大众文化浪潮等力量，逐步形成众声喧哗的创作局面，游离于政治体制外的创作日趋活跃。但政治主导意识形态的力量无论在社会文化资源的掌控上，还是对社会阅读倾向的引导上，仍具有强大的影响，文学创作层面上的自由仍然是有“度”的。由于社会体制改革的滞后，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遭到压抑，仍有可能影响文学的发展。新时期30年祖国大陆文学的变革是巨大的，而其内在性仍然是社会主义文明主导下的文化消费的多样性，创作的某些根本性层面仍有缺失。

自然，上述文学课题的实践仍是一种“交叠和共存”，而以此为依据，我们可以较清晰地把握到从五四前后到1937年，战时8年、战后至1970年代、近30余年四个时期现当代文学的转型、分合。它对近百余年台湾文学的分期也是有启发意义的。本书就尝试从割让到战前、战争时期、战后30年和近30年四个阶段来讲述双甲子台湾文学。前三个阶段做文学史的观照和描述。近30年文学不宜“入史”，则从文学批评式的初步梳理。

# 目录

## 前言

面对台湾文学，我们该有什么样的现当代文学史观 ..... 1

## 第一章 从汉文学到新文学（乙未割台至1920年代末）

- 第一节 乙未割台后的汉文学 ..... 1
- 第二节 文学革命和新文学开拓期的台湾文坛 ..... 8
- 第三节 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 11
- 第四节 张我军、杨云萍等台湾新文学先驱者的创作 ..... 18

## 第二章 呈多元发展趋势的台湾新文学（1930年代初至1937年）

- 第一节 左翼和乡土：1930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 ..... 22
- 第二节 杨炽昌和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启 ..... 29
- 第三节 新旧兼容中的通俗文学 ..... 33

## 第三章 重挫后的再生：战争时期（1937—1945）的文学

- 第一节 潜在对峙、多重分化的战争时期文学格局 ..... 38
- 第二节 杨逵、吴浊流的文学活动和创作 ..... 42
- 第三节 吕赫若、张文环、龙瑛宗的文学创作 ..... 49

## 第四章 战后文学的重建和发展（1945至1970年代中期）

- 第一节 去殖民性进程中的光复后初期文学 ..... 58
- 第二节 “二二八”及其后文学 ..... 65
- 第三节 1949年后政治高压缝隙中发生的多种文学思潮 ..... 75
- 第四节 回归现实和历史的乡土文学思潮 ..... 84

## 第五章 多元典律初步建构中的小说（上）

- 第一节 国民党意识形态背景下的小说：潘人木、姜贵等的创作 ..... 91
- 第二节 朱西宁、司马中原等的中原乡土叙事 ..... 100
- 第三节 钟理和、钟肇政等开启的战后台湾乡土叙事 ..... 106
- 第四节 《台湾文艺》时期的乡土叙事（上）：李乔、王祯和、宋泽莱 ..... 112
- 第五节 《台湾文艺》时期的乡土叙事（下）：郑清文、黄春明、陈映真、洪醒夫 ..... 120

## 第六章 多元典律初步建构中的小说（下）

- 第一节 《现代文学》开启的现代小说：白先勇、王文兴、七等生等 ..... 132
- 第二节 女性文学的崛起：林海音、聂华苓、施叔青等的小说 ..... 142
- 第三节 旅外台湾文群：於梨华、陈若曦、郭松棻等的小说 ..... 156
- 第四节 多文类的通俗文学：琼瑶、古龙、张系国等的小说 ..... 167

## 第七章 两个传统汇合中的新诗创作（上）

- 第一节 突围出“战歌”“颂歌”的新诗多流派格局 ..... 174
- 第二节 现代诗二老：覃子豪和纪弦 ..... 183
- 第三节 现代诗八家（上）：余光中和罗门等的诗 ..... 192
- 第四节 现代诗八家（中）：郑愁予、周梦蝶和杨牧 ..... 201
- 第五节 现代诗八家（下）：洛夫、痖弦、商禽等的诗 ..... 211

## 第八章 两个传统汇合中的新诗创作（下）

- 第一节 笠诗社“跨语言一代”（上）：陈千武、林亨泰等的诗····· 221
- 第二节 笠诗社“跨语言一代”（下）：白萩、陈秀喜等的诗····· 228

## 第九章 大格局的散文和“小实验”的戏剧

- 第一节 三种类型的散文格局和梁实秋等人的散文创作····· 236
- 第二节 战后散文第二代：艾雯、张秀亚、琦君等的创作····· 241
- 第三节 战后散文第三代：王鼎钧、柏杨、林文月等的创作····· 250
- 第四节 台湾新戏剧潮流：姚一苇、张晓风等的剧作····· 262

## 第十章 近30余年（1980年代至今）文学（上）

- 第一节 政治威权终结后文学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展开····· 272
- 第二节 原住民文学30年····· 278
- 第三节 自然书写30年····· 286
- 第四节 “眷村第二代”作家的创作····· 290
- 第五节 女性文学的再次勃兴····· 297
- 第六节 旅台马华文学60年····· 306

## 第十一章 近30余年（1980年代至今）文学（下）

- 第一节 开启当代都市文学新纪元的小说····· 308
- 第二节 世代替换中的新诗····· 317
- 第三节 多品类发展的散文····· 323
- 第四节 草根性和先锋性融汇的戏剧····· 329

## 后记

- 致敬、珍惜台湾文学····· 334

## 第一章 从汉文学到新文学（乙未割台至1920年代末）

### 第一节 乙未割台后的汉文学

1895年，清政府将台湾“永远”割让给日本，台湾绅民从切肤之痛中奋起保卫台湾，从唐景崧、刘永福相继领导的乙未割台战争，1896年陈秋菊、詹振等发动的反攻台北城开始，台湾“保土卫国”的大规模武装斗争一直延续到1902年，台湾总督府采取剿灭和招抚双管齐下的政策后。而在1915年，又爆发了台南西来庵事件这一台湾最大规模的武装抗日斗争，遭到日军残酷镇压。此后，针对殖民当局转向采用“文治”“化俗”政策，台湾人民也从武力抗日转为政治抗日、文化抗日。台湾文人除了丧国之痛，还比大陆士人更早失去了科举仕途，他们除与民众一起抗日外，纷纷选择创作作为抵御外敌的重要方式，“舆图易色，民气飘摇，侘傺不平，悲歌慷慨，发扬蹈厉，凌轹前人，台湾之诗今日之盛者，时也，亦势也”<sup>①</sup>，台湾汉诗文在台湾被割让之后，反而呈现出强盛之势。

据王嘉弘统计，生卒年经历了台湾被割让事件而创作有相关诗文的作家有117人<sup>②</sup>，其中不乏光绪时期的台湾文学名家，如蔡国琳（1843—1909，光绪八年中举，光绪十六年以乡试第三名授国史馆校尉，1906年台湾南社首任社长，著有《丛桂斋诗钞》4卷）、吴德功（1850—1924，著有《瑞桃斋诗稿》《瑞桃斋文稿》《瑞桃斋诗话》等，多述怀感兴之作，亦多书台湾风土民俗物产）、洪弃生（1866—1928，光绪十五年台南试秀才第一）、王松（1866—1930）、胡殿鹏（1869—1933，台南安平人，《台湾日日新报》《全台报》等主笔，浪吟诗社、南社等发起人之一，著有《南溟诗草》）等。“台湾诗坛三巨擘”——丘逢甲

① 连横《台湾诗乘·序》，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版，第1页。

② 王嘉弘《如此江山——乙未割台文学与文献》，台南台湾文学馆2011年版，第61页。